2009年度 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成果報告書

作為道德／語文教育教材的《論語》

—以近代日本中學校教科書／漢文學參考書所作的考察

金培懿

国立台湾師範大学

招聘期間（2010年1月17日～2月15日）

2010年

財団法人 交流協会

作為道德／語文教育教材的《論語》

—以近代日本中學校教科書／漢文學參考書所作的考察

金培懿

摘要

日本明治維新以還，《論語》相關論著魚貫問世。出版界或重刊江戶儒者訓點朱熹《論語集註》者，或刊行江戶時代之《論語》注釋名著，而近代日人重新注解、講說、標注、翻譯、研究《論語》等相關論著更多達五百數十種。本文有鑒於日本自明治五年(1872)施行西方學制後，《論語》作為中、高等學校「漢文」科目之必選漢文教材，坊間書肆各類《論語》相關之教科用書、參考書遂應運而生，充分反映出日本之《論語》注解、講釋、研究，由近世漢學式的經典注釋過渡到近代漢文教育教材的實相。故本文以明治以還至終戰為止，作為漢文科教材或參考書的《論語》著作為研究考察對象，首先將此類論著加以分類並說明其著作內容、特色及意義為何？同時說明此類著作所以出版問世的時代意義，進而分析其作為漢文學習教材所欲達成的道德、語文教育目的為何？反映出何種日人漢文素養的變化與轉向。最後則從日本近代漢學發展史的脈絡，說明此類作為中學校漢文教科書、學習參考書的《論語》相關著作，究竟突顯出何種漢學近代化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明治漢學、《論語》、四書、漢文教科書、道德教育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s a Textbook on Morality and Literature: The Explor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s Textbook and Reference on Chinese Classics in Modern Japan

CHIN PEI-YI

Abstract

Many treatises related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ere published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y re-published Zhu Xi's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the Analects punctuated by Confucians in Edo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he Edo period. What is more, there are hundreds of treatises related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modern Japan. The western school system was executed in Japan from 1872,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the textbook on Chinese classics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in Japan. Therefore, the reference and textbook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ere published,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urned from si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to textbook. This essay focus on the textbooks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at published in the period of 1878—1945. Through the research, this essay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textbooks and their lo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reatises related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Modern Japan, then explains their contents, characteristic and purpose. We can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the literacy on Chinese Literature of Japanes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ime of the textbook 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rom the sight of the history of sinology in modern Japan.

Keywords : sinology in Meiji perio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our Books, reference on Chinese classics, the education on literature, the education on morality

作為道德／語文教育教材的《論語》

—以近代日本中學校教科書／漢文學參考書所作的考察¹

金培懿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日本進入明治時代後，隨著維新政策的開展，無論政治、軍事乃至教育等方面，基本上皆以模仿西方加速西化為其主要之重大改革目標。甚至為求快速躋身進西方列強的行伍中，明治新政府當局與民間人士或團體，不惜採取割裂近代與傳統、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文化關連，試圖藉由向歐美文明看齊與全盤西化來達成其國族全體的近代化。但《論語》作為日本代表性的傳統之一，其並未在日本舉國追求近代化的政策維新、文明開化中消失，相反地，明治時代以還，日本國內《論語》相關論著魚貫問世。出版界或重刊江戶儒者訓點朱熹《論語集註》者，或重新「標注」(於書頁天頭下注解)《論語集註》，或再度刊行江戶時代代表性之《論語》注釋名著，因而近代日人重新注解、講說、標注、翻譯、研究《論語》等相關論著，其數量多達五百數十種。

而截至 1945 年終戰為止，這些日本國內刊行問世的數百種《論語》相關著作，不少是日本自明治五年(1872)施行西方學制後，因為《論語》係中、高等學校「漢文」科目之必選漢文教材²，故作為漢文教育與漢文學習之教科書、參考書的《論語》注解、講說、標注、翻譯、研究書遂相繼問世。又因為近代日本在施行西化，亦即近代化的過程中，與西化、近代化之目的乃重在習得「洋才」這一技術層面相對的，漢學或漢文學習則幾乎皆被定位在「和魂」這一所謂日本固有、傳統之精神、道德層面的涵養。換言之，所謂的近代化其實呈現出一種傳統與現代性並存的雙重構造。

¹本文係筆者獲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 2009 年度日本交流協會招聘活動研究獎助，於 2010 年 1 月 17 日至 2010 年 2 月 17 日，前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執行「学生用テキストとしての『論語』—近代日本の漢籍に対する眼差し」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該研究活動結束返台後，筆者將研究所得撰寫成本文，並於 2010 年 3 月將之投稿至《中國學術年刊》第 32 期(秋季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10 年 9 月)，目前已獲審查通過，期刊付梓中。在此特別感謝日本交流協會之獎助，又投稿之際兩位審查委員所提供之寶貴意見，使本文有機會進一步修正研究所得，今謹一併深致謝忱。

²例如井原正平講述、飯島忠夫監修：《新撰漢文叢書 論語新講》(東京：三省堂，1933 年)該書〈緒言〉第三條便言及：「歷來，上級學校之人學考試題目，選自此書(論語)者，不遑枚舉。」(頁 1)。

本文因此以明治以還至終戰為止，作為漢文科教材、參考書的《論語》相關著作為研究考察對象，試圖探討在近代日本的中學漢文教育中，《論語》這部傳統的儒家經典是如何被重新接受涵容，是以何種形態在近代日本的中學教育體制內被教授、傳播，並藉此究明日本漢文教育由近世過渡轉變到近代的實相。首先說明此類著作所以出版問世的時代意義，並為其在近代日本《論語》相關論著出版史中作一定位。繼而將此類著作加以分類並實際說明其著作內容、特色為何？又此種特色具有何種意涵在其中？進而分析其作為漢文教材所欲達成的道德、語文教育目的為何？同時反映出何種日人漢文素養的變化與轉向。最後則從日本近代漢學發展史的脈絡，說明此類作為中學校教科書與漢文學參考書的《論語》相關著作，究竟突顯出何種日本漢學近代化的時代意義。

二、近代日本《論語》相關論著之類型區分與特色說明

如前言所述，明治時代以還至終戰為止，日本國內刊行問世之《論語》相關著作，據筆者調查，總數約有五百數十種，然其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大類型：1、訓點、校注朱熹《論語集注》者；2、江戶代表性《論語》注解名著的刊行；3、漢文教學用書、漢文讀本、漢文參考用書《論語》的發行；4、近代日人的《論語》新解書。其中除了第二類型的江戶代表性《論語》注解名著之外，其他三大類型的《論語》相關論著，都曾作為日本戰前中學校的漢文教科用書或漢文學習參考書。下文將按上述各類型《論語》相關論著之內容性質，依序說明其特色與意義。

(一)訓點《論語集注》與刊行江戶《論語》注解名著

1、訓點、校注《論語集注》

首先，關於明治 10 年代以還訓點式《論語》講解書為何會大量刊行問世，此問題一言以蔽之，其實是延續江戶初期以來的四書、《論語》傳統學習法。³至明

³江戶初期日本儒者對朱子學的吸收涵化，例如林羅山與貝原益軒等，基本上是以明代為科舉應試所出版的標準「四書學」，亦即《四書大全》類的學習書為憑藉，而來理解朱子學。因此江戶儒者必須在面對《四書集注》的同時，一併學習明人繁瑣的《四書集注》注疏。如此一來，江戶儒者必須在選取明末各種《四書集注》注疏本後，才能有所依循方向地誦讀四書和《四書集注》。故江戶初期的儒者的朱子學學習，例如林羅山並不是直接對《四書集注》進行再詮釋，而是致力於對陸續傳來日本的明代四書讀本添附「訓點」（亦即漢文訓讀標點，包含讀音順序、符號和讀音假名），以利當時日人誦讀《四書集注》。林羅山加附訓點的《四書集注》等漢籍，就在日本以和刻本形式陸續出版，因為是羅山所訓點，而其號曰道春，故名曰「道春點本」。

又江戶時期的和刻本一般皆附上和文訓點後才出版，為的是方便時人誦讀漢籍，當時羅山因為貴為幕府儒官，故其「道春點」最具權威。而與其立場對立的則是京都朱子學者山崎闇齋的「嘉點本」，

治 30 年代中期為止，重刊江戶儒者訓點《論語集注》之著作的這一風氣相當流行，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推當時日本各地出版社頻繁重刊後藤芝山訓點的《論語集注》。據筆者查閱，至明治 33 年(1900)為止，該書至少重刊過 10 次。其中自明治 15 年(1882)至明治 17 年(1884)三年間，該書分別由東京的山中孝之助等人，以及水野幸、福岡的磊落堂、東京的中外堂等前後重刊過四次。由此亦可窺知，即使時入近代，以漢文訓讀來教授初學者的漢文學習途徑依舊不變。而除了後藤芝山所訓點的《論語集注》外，其他陸續於明治年間問世的他家訓點《論語集注》亦不少。⁴當然由此點亦可看出朱熹《論語集注》歷久不衰的「代表性經注」地位。

其實近代日本中、高等學校漢文教科用教材中所收《論語》部份，也都以朱注為準據。而到了明治 45 年，早稻田出版的《漢籍國字解全書：先哲遺著》叢書問世，第一卷中便收入了中村惕齋的《論語訓蒙句解》。足見以訓點文來啟蒙、引導初學者的漢文學習，始終是明治時代的主要方法。甚至在明治 41 年，依田喜一郎還訓點了李雅各(James Legge)的英譯《論語》，而若據大正 5 年(1916)問世的林泰輔《論語年譜》中的載錄情形看來，日本自明治 40 年代以還至大正 5 年左右的 10 年中，近代日本學界已經非常關注西方世界的《論語》譯注作品，而此事由當時澀澤榮一亦蒐集到李雅各與朝鮮時代的《論語》、《四書》相關論著看來，不

而京都另一朱子學者中村惕齋的點本則稱「惕齋點」。又九州地區的朱子學者貝原益軒之訓點，因為平易近人而流傳到江戶，人稱「貝原點」。其後又有後藤芝山的「後藤點」，以及江戶中期以後普及各地的佐藤一齋的「一齋點」等。

和刻本自寬永年間(1624-1643)由坊間書肆開始印行，至元祿時期(1688-1703)以還與日劇增，進入大量出版盛行期。而隨著民間儒學學習階層的擴大，更加刺激了「四書」相關習書、啟蒙書的出版，此類和刻本當中除了加附訓點的《四書大本》等明代四書學的和刻本之外，同時也包含了明代四書學的注疏本。也就是在此種風潮中，進而出版了更為平易的《四書集注》學習、啟蒙書，例如於享保 4 年(1719)刊行的中村惕齋《四書示蒙句解》28 卷 14 冊即是。該書設定的讀者是當時無法直接誦讀以漢文寫成的《四書集注》，但又試圖誦讀學習《集注》的初學者。而與《四書示蒙句解》相較，正德 5 年(1715)刊印的毛利貞齋《四書集註俚諺鈔》50 卷 50 冊，雖同樣以當時片假名間雜的平易日語來標注解說文，但該書會適時引用以漢文寫成的明代四書學的注疏類文獻，明示其解說之根據，故學術性較高，也較具難度，故該書堪稱是江戶人從入門初學者過渡到專業漢學者的四書銜接讀物。

據以上說明，明治時代四書或《論語》訓點本的流行，其實正是日本江戶以來學習朱子學、四書學乃至《論語》的傳統。

⁴ 例如至明治 10 年代中期為止，就陸續有芝田好章點、太山東嶽校訂：《四書集注》(京都：永田調兵衛，1873 年)；橫尾謙點：《四書集注》(大阪：田中太右衛門，1876 年)；瀧澤清點：《四書集注》(東京：安藤橘綠，1879 年)；後藤松陰點：《論語集注》(浪花：清玉堂，1881 年)；蒲池彌太郎點：《四書集注》(盛岡：藝香閣，1881 年)；內村友輔點：《論語正文：音訓附》(松江：石原光璋，1882 年)；內村友輔點：《鼈頭論》(松江：大蘆利七等，1882 年)；後藤嘉平點：《改正訓點四書集注》(大阪：青木嵩山堂，1883 年)；田中宗確點：《論語集注》(東京：九家善七，1883 年)等書相繼問世。

僅可再度獲得證明，同時也可窺知日本對東亞整體的關心。

而在一片重刊、新刊訓點本《論語集注》的風潮中，要到明治末年日本地方上才有重刻何晏《論語集解》者，亦即《論語集解：模刻古本》（津：豐住書店，1910年）的刊刻問世。又此種重新印行出版江戶《四書》或《論語》「訓解」、「訓蒙」代表性書籍的現象，還反映在明治時期大阪與東京兩地之出版社，皆曾分別重新印行出版溪百年的《經典余師 四書之部》⁵，足見以「獨學」、「自修」、「自習」方式學習漢籍的風潮流行全國。

2、刊行江戶《論語》注解名著

其次，關於江戶《論語》注解名著被重新刊行問世的，首先當推安井息軒《論語集說》，自明治5年(1872)至明治7年(1874)三年間，該書分別由東京的稻田左兵衛等人與伊東祐歸刊行過3次，日後更於明治42年(1909)收錄進《漢文大系》第一卷。其理由除了因《論語集說》乃結合清朝考證學與江戶諸學派之《論語》注解成果的這一學術理由之外，還因息軒乃幕末官學昌平黌的儒官之一，且其門生多有位居明治政府要職或為學界要角者。⁶除了安井息軒之外，龜井南冥、昭陽父子之《論語語由》、《語由述志》二書，相較於其先前在江戶時代受到特意的打壓，《論語語由》於明治12年(1879)、13年(1880)相繼由大阪的桑林堂與華井聚文堂分別刊行，後因澀澤榮一非常推崇南冥的《論語》義理解釋，除了於二松學舍的課堂中大力讚揚外，澀澤榮一更以個人名義出資，於大正8年(1919)複製了附有昭陽親自朱筆傍注的玻璃版《論語語由》，並將之分送親友與學界人士，而昭陽的《語由述志》手稿本也於大正11年(1922)，同樣由澀澤榮一自費影印刊行。

7

另外，同樣是古學派的伊藤仁齋之《論語古義》，經佐藤正範校訂，於明治42年(1909)由東京六盟館刊行。荻生徂徠之《論語辨》，則經樋口酬藏、祥雲確悟補校後，分別於明治43年(1910)、大正9年(1920)，由東京天書閣、國華堂刊行，惟國華堂刊行時將之更名為《掌中論語》。古學派之外，懷德堂儒者的《論語》注書也自明治44年(1911)以還，重刊陸續問世，其中的代表著則首推中井履軒《論

⁵ 溪百年編注之《經典余師》，收錄有各種漢籍入門書，乃江戶天明年間(1781-1788)以還日本庶民獨學儒家典籍的主要讀本、自修參考書。該書當時在日本各地流通、普及，不僅持續流行到幕府末年，書中所收錄之部份入門書甚至在明治時代仍是暢銷的漢文學習參考書。例如明治年間就曾先後由大阪同盟社刊行《經典余師 四書之部》(刊行年不詳)；東京日吉丸書房刊行《論語經典余師》、《大學余師》、《中庸余師》(1909年，皆由宮崎璋藏校)；東京寶文館刊行《論語國字解》(溪百年述，深井鑑一郎校，1910年)三度出版該書。

⁶關於此點，詳參町田三郎：《江戶の漢學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安井息軒研究〉。
⁷有關澀澤對龜井《論語》學的推崇，詳參金培懿：〈旁白敘事·聲音傳達·意象建構—澀澤榮一《論語講義》研究〉(《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8期(2006年12月)，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頁31-80。

語逢原》。例如，該書首先被收入懷德堂記念會所編纂的《懷德堂遺書》(大阪：松村文海堂，1911年)第6-第9冊中，隔年的1912年又再次由東京東陽堂刊行問世，而懷德堂記念出版會也同樣於該年，以活字版分三冊重刊該書。

而此種印行出版江戶代表性《論語》注釋書的作法，特別是以叢書形式刊行江戶邦儒之《論語》相關著作的，早在明治16年(1883)由甫喜山景雄編的《典籍考叢：我自刊我》(東京：甫喜山景雄，1883年)第2集中，就已經收錄有栗原柳庵的《論語考》。以叢書形態刊行江戶代表性漢籍注解書的作法，到了明治末年大為流行，自明治40年代以還至大正初年為止，以出版叢書的方式集體呈現江戶漢學研究成果的，首先有服部宇之吉所領銜編輯之《漢文大系》(東京：富山房，1909-1912)全12卷，繼而有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所籌劃的《漢籍國字解叢書》(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9-1917)全45冊，此兩部叢書皆由當時春秋鼎盛之錚錚學者，在原著上加註新解，所收錄之江戶漢學名著之範圍也不再侷限於《論語》，舉凡江戶先儒之各種代表性著作皆收錄其中。

除此之外，明治末年尚有《漢文叢書》與《國譯漢文大成》兩部叢書問世，到了昭和初年，則有崇文院編輯之《崇文叢書》第1、2輯(東京：崇文院，1927-1935)問世。與此一潮流相呼應的，有關江戶儒者《論語》相關注解書的集結出版，則是自大正11年(1922)至大正15年(1926)，由關儀一郎編輯、服部宇之吉等人校訂，五年間陸續出版問世的《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全10卷，日後更再次出版續集《續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7-1930年)全3卷。⁸此部叢書所收錄之江戶《論語》注解名著，宛若日本注解《論語》的代言人，日後也成為日本各級學校之《論語》教科書、參考書中，用來與朱熹《論語集注》對話的主要參考值。

例如從所謂「鼈頭注釋」、「頭書略解」、「頭書插畫」，或是由書商編纂之少年叢書中之「漢文學講義」、「漢文叢書」等此類中學生《四書》學習參考書，到明治10年代中期以還陸續出現的所謂「論語講義」此類各級學校的《論語》講義錄，或是坊間出版的少年「論語讀本」與「全譯」、「詳解」等此類漢文學習教科、參考用書，乃至標榜以鍛鍊青少年、國民之「精神」，作為「修養」、「教養」用書的「論語講話」等此類《論語》注解、講解書，無不以朱熹《論語集注》為依據。而在上述各類型的《論語》教科、參考用書中，若有提及朱注以外的江戶先儒參考注解，大致不出《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與《續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中所收錄之江戶各家《論語》注解書，並以之與朱注進行《論語》考證、義理等方

⁸《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所收江戶儒者之《論語》注解書，第3卷收錄伊藤仁齋《論語古義》、佐藤一齋《論語欄外書》。第4卷收錄龜井南冥《論語語由》、豬飼彥博《論語考文》、市野光彥《正平本論語札記》。第5卷收錄皆川淇園《論語釋解》、吉田篁墩《論語集解攷異》。第6卷收錄中井履軒《論語逢原》、廣瀨淡窗《讀論語》第7卷收錄荻生徂徠《論語徵》、豐島豐洲《論語新註》。第8卷收錄東條一堂《論語知言》。而《續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第2卷則收錄照井全都《論語解》。

面之對話。而在近代日本《論語》相關教科、參考用書中，最能凸顯此一特色者，主要以瀧川龜太郎《教科用 纂標論語集注》(東京：金港堂，1912 年)、島田鈞一《論語全解》(東京：有精堂書店，1928 年)、諸橋轍次《標注論語講本》(東京：目黑書店，1943 年)三書為代表。

由上文對第一、第二類近代《論語》相關論著的說明看來，可知時代、政權或可一夕改朝換代，然學術的發展卻有其連續性脈絡發展，無法斷然割裂。江戶人雖然在一夕之間跨入明治這一「近代」，但學問性質與型態卻仍舊不免充滿「江戶漢學」式的色彩。換言之，明治維新以還，日本曾試圖割捨掉其國族發展至江戶時代的漢文化傳統，積極攝取西洋文明，闊步邁向近代化路途。但是，在明治以還的近代化過程中，《論語》作為日本的傳統漢文化代表之一，這部經典不僅從未自近代日本社會中消失，在近代日本的《論語》注解、講釋史中，朱子《論語集注》始終是一與江戶先儒之《論語》注釋書相互參照的主要對象，《論語集注》仍是任何試圖憑藉《論語》以入漢文學海、聖學堂奧的後人們，必經的重要門徑。另外，我們不妨將延續訓點式的漢文學習法，以及參照江戶先儒之漢籍注解成果的這一近代日本的《論語》學習、研讀現象，視為江戶漢學過渡到近代「支那學」、「中國學」的必經過程。

三、作為中學校漢文教科、參考用書的《論語》講解書

第三類所謂漢文教學用書、漢文讀本、漢文參考用書《論語》的發行，基本上又可分為兩種基本型態：一是作為漢文自修學習參考用書的「頭書、鼈頭《論語》注解書」與「插畫《論語》注解書」。二是作為漢文科授課、學習、自修用教材的「論語講義錄」或「論語教本」、「論語讀本」。此類書籍主要皆以中學生為對象，而來編纂漢籍學習的入門參考書，其中「講義錄」的《論語》教科、參考用書型態更是廣佈各級學校。⁹

蓋明治維新的重要政策之一，就在教育改革。然明治 5 年(1872)新學制施行時，卻產生新式教材嚴重缺乏的問題，該年編制的課程表中，仍有「句讀」科目，初階仍用《論語》、《孟子》、《孝經》；高階則用當時有名之洋學家箕作麟祥於明治 4 年(1871)編譯的《泰西勸善訓蒙》。¹⁰文部省於是根據既定政策理念，著手編纂或翻譯教科書並普及之，形成了所謂「翻譯教科書時代」。據說新學制公布時，由於沒有適宜教材，連當時剛出版的福澤諭吉《學問のすすめ》(勸學)一書，也被作為

⁹以「論語講義」為名之漢文教科、參考用書，明治 10 年代中期以還相繼問世一事，詳參金培懿：〈轉型期《論語》研究之主旋律－近代日本《論語講義》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編：《臺灣學術新視野－經學之部》，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7 年)，頁 335-392。金培懿：〈近代日本《論語》研究之轉折－安井小太郎《論語講義》析論〉，《國文學報》第 40 期(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6 年 12 月)，頁 19-73。

¹⁰詳見海後宗臣、仲新：《近代日本教科書總說－解說編》(東京：講談社，1969 年)，頁 48。

代用教科書。¹¹此時明治政府並未禁止民間編纂、出版教科書，事實上學校在選取教科書方面也是自由的，正因如此，所以傳統漢學／漢籍也就順勢獲得其生存延續發展空間。

又因教科書嚴重短缺，所以新學制施行隔年的 1873 年 4 月，明治政府遂決定採用三本傳統道德修專著作為教科書之補充，即江戶時代無名上人譯《和語陰鸞錄》、上羽勝衛《勸孝邇言》¹²、石井光致《修身談》¹³三書。由此可看出明治政府所編纂、選定之教科書，非常著重「道德修身」，而且特重「孝道」。而此種沿用《四書》作為新式學校高年級教科書，¹⁴並且重視道德、修身的教育特色，不僅依然充滿著江戶漢學的舊色彩，也成為明治以還《論語》相關論著的兩大特色，亦即作為漢文科教材的《論語》，其不僅是漢文科的「語文」教育教材，同時也是人格修身之「道德」教育教材。

(一)「頭書」、「鼈頭」、「插畫」《論語》注解書

近代日本《論語》相關論著中，作為中學校漢文教科、參考用書的《論語》講解、注解書，除了名為「教科用」或「讀本」的《論語》講解書外，明治時代主要有以「頭書」、「鼈頭」注解《論語集注》再輔以插畫等型態者；還有以「漢文學講義」、「和漢文學講習」等型態出現的《論語講義》類；以及將朱注與江戶儒者之注解並列比較的所謂「纂標」、「標注」《論語集注》者等三大類型。

首先，此類於書本天頭處或略解字義，或加入插圖以說明禮器名物等所謂「頭書」、「鼈頭注解」形式來解說《論語》的注解書，最早當推重田蘭溪的《頭書圖解四書略解》(東京：篠崎才助，1875 年)，繼而則有大賀富二編輯的《頭書插畫四書字類大全》(東京：同盟書房，1881 年)。該書依據朱熹《論語集註》，僅解釋各章經文字詞，突顯出《論語》作為漢語語文教材這一特色。而天頭冠解部份，則同樣有人名、地名以及天文地理名數器物和該章重要經句的簡要說明，同時還加入插圖幫助學生理解。接著又有宮島純熙編纂的《頭書略解四書字類大全 論語》

¹¹詳參紀田順一郎著、廖為智譯：《日本現代化物語》(台北：一方出版，2002 年)，〈教科書〉，頁 70。

¹²上羽勝衛《勸孝邇言》(東京：惺惺軒，1873 年)作於 1873 年，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取江戶時代以來一直用於幼童道德教育啟蒙的，由儒者室鳩巢以和文翻譯的《六論衍義大意》中關於「孝道」之部份；下篇則記述歷史人物的孝行事蹟。

¹³石井光致《修身談》(東京：千鍾房，出版年不詳)為幕末 1830 年刊行之作，分上、中、下三冊，其編纂方式主要選取中國典籍中具有訓示意涵的文句，附以實例說明。當時其他「修身」相關的教科書尚有：1874 年根據《六論衍義》而編纂的石村貞一《修身要訣》(大阪：松田正助等，1874 年)，以及同年編纂成的土屋弘《人之基：修身》(大阪：鹿田靜七，1874 年)，該書以「嘉言」與「人物事蹟」方式，分〈孝行〉和〈兄弟友愛〉兩章；另外還有匯集中、日兩國之禮法與道德，於 1873 年編纂成的西坂成一《訓蒙軌範》(東京：山本良齋，1873 年)。

¹⁴海後宗臣、仲新：《近代日本教科書總說—解說編》，頁 16。

(東京：文求堂，1884)。該書與大賀富二《頭書插畫四書字類大全》性質類似，同樣依據《論語集註》，也僅解釋各章經文字詞，同樣著重在透過《論語》這部漢籍來學習漢語語彙。體例上也同樣在天頭冠解部份，對重要人名、地名以及天文地理名數器物和該章重要經句加了解釋，同時加入插圖幫助理解。

此類書籍基本上都在解釋《論語》各章字詞意義，故全書正文的主要內容並非逐篇逐章羅列《論語》原文，而是以「詞語」解釋為主來羅列辭條，各辭條下則以漢文訓讀形式標示讀法、讀音與詞義。因此其所設定的讀者群，顯然就是漢文初學者，大賀富二言：

凡古書之文，古今有異，文字難解。此編固為便於初學者，故務用切近字義之國字，因而敢忌高尚，更不擇雅俗。¹⁵

到了明治 20 年代後期，榊原英吉編輯的《鼈頭註釋四書自學自在》(東京：求光閣，1892 年)一書，在篇名與各章經文原文旁標示「訓點」與「漢字讀音」；天頭所書者除了字詞解釋之外，更適時附上插圖作解。但即使仍採天頭注解方式，其正文卻是按照《論語》篇章次第順序臚列出標示訓點的原文，而天頭處所謂的「鼈頭」注釋，則是詞條的字詞解釋以及插圖。而值得注意的是：與明治 20 年代中期以前刊行的此類書籍相比，榊原英吉該書不只是禮器名物，其甚至連文章「意義」也都試圖以「圖畫」來說明之。¹⁶此種以「插圖」來說明專有名詞或是輔助理解《論語》經義的作法，時入昭和仍舊蔚為風潮。¹⁷

(二)「論語講義錄」

另外，明治 20 年代以還，某些以「論語講義」為名的《論語》注解書，則不

¹⁵大賀富二編：《頭書插畫四書字類大全》(東京：同盟書房，1881)，〈凡例〉，頁 1 下。

¹⁶該書在解說〈學而·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章時，於天頭處以插畫形式來說明「貧而樂」、「富而好禮」二話之意義。該幅插圖畫著某位穿著華服戴洋帽的富人，來到一位居宅簡陋破舊的學者家，該位學者衣衫襤褸、家徒四壁，不僅宅壁斑駁剝落，紙糊門窗也破洞無數，但學者跪坐的背後屏風上，則寫有「貧而樂」三個大字，圖畫左下方的榻榻米上又再次標明「貧而樂」，說明這是該位學者的境界。而富人脫帽於旁、置扇於前，跪拜在學者面前，畫面右邊牆上則寫有「富而好禮」，說明富人之態度。詳參榊原英吉編輯：《鼈頭註釋四書自學自在》(東京：求光閣，明治 25 年(1892))，頁 5 上。

¹⁷例如為紀念昭和天皇登基大禮，當時弘道館籌編了一套「昭和漢文叢書」，書中收有宇野哲人撰著之《論語新釋》(東京：弘道館，1927 年)。兩年後的昭和 4 年(1929)該書重新出版，除了附上〈緒言〉、〈目次〉之外，更於內文中附上禮器名物制度的「插圖」，宇野本人更於〈緒言〉中說明因為發行本書的書肆希望能附上插圖，而插圖有助於學生理解本文(頁 1)。另外，岡泰彥編：《新選論語 高學年用》(東京：標準教科書出版協會，1933 年)該書書前，先附有一幅「先師孔子行教像」，其後就有 3 頁附圖，前兩頁附圖所畫之內容，皆是《論語》中出現的禮器名物等，第 3 頁則是「春秋戰國圖」。足見附圖說明《論語》的這一講解方式非常流行且符合市場需求。

再加入插圖，也不以「頭書」、「鼈頭」或「標注」形式來解說《論語》，而是延續江戶以來主流的講說經義方式，亦即所謂的「講義」形式而來講解《論語》經義。例如鈴木無隱《論語講義》(京都：1887年)、稻垣真久章《少年叢書漢文學講義 論語講義》(東京：興文社，1891年)、花輪時之輔《中等教育和漢文講習書 論語講義》(東京：誠之堂書店，明治26年(1893)等書即是。惟此類書籍中的「講義」部份，多是附在標有訓點的原文後，且幾乎都是以當時淺白易懂的白話日語書寫。

例如稻垣真久章《少年叢書漢文學講義 論語講義》該書構成爲：篇名「題意」；「原文」標「訓點」；字詞「解釋」；各章「講義」，但全書無一插圖，且本書前後曾數次出版。而引起人注意的是，據該書文後所附興文社出版社的廣告看來，稻垣真久章在興文社所出版發行的《學生必讀漢文學全書》八冊系列中，還有《標注四書讀本一書》，而且該書還獲得10家報社的大力推薦。

在明治年間由坊間書肆出版，提供中學少年學習漢文科參考用的叢書、全書系列的《論語》參考書中，稻垣真久章的《四書講義》堪稱是最受歡迎的。而其《標注四書講義》所以獲得好評的原因，除了《朝野新聞》所謂：「修漢文學者當以經學爲基礎，而其第一步在取《學》、《庸》、《論》、《孟》，此古今一致」、「《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爲教育書，或爲文學書，我社界之所以一顧不能免，在其所謂載道之文也。」¹⁸這一理由外，誠如《東京朝日新聞》所評斷的，主要乃是稻垣真久章的漢文訓點雅正、句讀分明，而且「為了不妨礙誦讀，其還刪去各家注解，又另外標注或隨時於本文中針對經文難解之字詞加以注釋說明。」

針對刪去各家注解，《國會新聞》也稱讚稻垣個人講義解釋「簡而明」，《國會新聞》更呼籲日本的漢文初學者：「千萬要依據此書以求入德之階梯」。《改進黨》也評其：「訓點正確，注釋簡明」。《國民之友》則稱讚其：「標注至極簡明，刻點頗爲妥當，作爲四書之讀本，今日之際，堪稱最上乘者。」《朝野新聞》則評其：「合四書爲本，傍加標注，頗便於攜帶。」此一評價也獲得《國民新聞》的認可。又《中央新聞》評論說：「《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藏於一冊中，和裝鑄活版，鼈頭添略註，宜也。」《寸鐵新聞》評其：「注解簡而訓點正，句讀文明，加之其釋文法，見意匠嶄新，特別是正文以三號活字排植，印刷頗鮮麗，而定價又廉，僅二拾余錢也。」關於印刷優美此點，《國會新聞》稱讚道該書：「本文都用三號活字，故用之爲讀本，不勞視力，不若其他活版印刷物品，有製造近視眼者之憂慮。」《改進黨》也說該書：「製本極古雅堅牢，印刷鮮明。」另外，關於將《四書》合爲一冊的作法，《日本新聞》也說：「實爲便於攜帶、便於「通覽」之讀本，故可課於學童，而且價亦廉。」而值得注意的是，《郵便報知新聞》的評論說道：「對於以知曉漢字爲目的的兒童而言，在教授其四書句讀時，如所謂注釋

¹⁸詳見稻垣真久章：《少年叢書漢文學講義 論語講義》(東京：興文社，1891年)書後所附「學生必讀漢文學全書」廣告，頁6。以下有關各家報社評論該書之語，出處皆同，爲清耳目，不再明注所出。

者，殆為無用也。此書由稻垣真衣白氏添加簡明標注，收浩瀚四書於一冊之中，不獨為一童子之便。」

由當時十家報社的評論看來，明治 20 年代中期以還的中學生，其在新式學校教育體制中面對漢文科，其學習方法顯然並非直接閱讀漢文，而是要憑藉標注在漢文原文旁的訓點來協助其進行閱讀，事實上學生們也無法自行句讀，甚至對於難解之經文字句，坊間參考書也都為其加上注解。換言之，所謂修習漢文學一事，其實其目的也只是在知曉字詞、理解文義，談不上辨析經注何者為是、為善，更遑論義理如何。故刪去歷代注釋的作法，反而有利中學生直接面對本文。或者說作為學校國語教育之一環的「漢文」學習，學生修習漢文科的目的已不是注解、析論經義，何況明治 20 年代中期的中學生，乃明治 10 年以後出生的「近代」新生代學生，其成長過程中，已無鄉先生或漢塾師帶領其「素讀吟味」四書等基礎漢籍，故當其自小學校畢業，進入中學校修習漢文時，其確實就是一位「漢文初學者」，亦即其學習漢文的目的，顯然是比較傾向語言工具性質的，故目標主要在識字、翻譯、理解層次，相當於是一種外國語言的學習；而非義理、思想、文化、生命層次的，以漢文來自我開啟或藉之參與世界的學習目的。

又從所謂合《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為一冊乃方便學童攜帶閱讀，是便利的漢文讀本這一觀點看來，雖說是朱子《四書集注》以還所謂四書乃是一完整學問體系的想法，但其中恐怕還包含著課堂上學習查閱與應付考試上的方便，甚至從所謂以三號活字排印、印刷鮮麗、製本古雅等皆為該本參考書之優點的說法看來，與其說這是對教本版本品質的要求，毋寧說在中學生的漢文科學習過程中，在攸關「漢文力」的養成這一讀物內容之外，諸如排版精美與否關係到學生的視力保健乃至購買意願，甚至物美價廉的精打細算也成了漢文學修習過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¹⁹也就是說，此種選擇漢文學習參考書的條件評斷，亦即漢文學習途徑的選擇考量，其實充滿著漢文學習就只是外文學習，漢文學習就是一種消費財的教養。故我們不難想見，在此群中學生世代成長茁成為青壯輩後，亦即在明治末年，或者說當日本進入大正時代後，那將是一個可預期的漢文「衰退時代」。

事實上，近代日本新聞報紙上「漢詩欄」的取消，正是在大正時代中期。²⁰除了稻垣真久章該書外，花輪時之輔的《中等教育和漢文講習書 論語講義》(東京：

¹⁹關於價錢也是發行、購買教科書、參考書時的重要考量因素此點，由明治時代因為僅東京上野有圖書館，而學術參考書專門的租書店也僅有幾家座落在神田本鄉一帶，故明治 20、30 年代學生想借閱此類教科、參考用書時，只要交付若干保證金，待還書時扣除借閱費用後餘額便可退還的簡易圖書館，或是同類租書店大為繁榮這一事實看來，當時購買得起或是願意掏錢購買教科、參考書的情形也許並不普遍。詳參山本笑月：《明治世相百話》(東京：有峰書店，1971 年)，〈オツな商賣貸本屋〉，頁 24-25。

²⁰大正中期漢詩欄被取消一事，詳參村山吉廣村山吉廣：《漢學者はいかに生きたか—近代日本と漢學》，頁 12。

誠之堂書店，1893年），亦堪稱此類書籍代表之一。該書分上、下兩冊，全書附插圖，到明治31年(1898)為止前後共印行八版，在明治中期堪稱是一本暢銷熱賣的《論語》參考書。稻垣與花輪二書的解釋與講義，皆以漢文訓讀體來書寫，其間所蘊含的意義，除了是參考書的非學術性質外，同時也突顯出明治20年代中期以還，面對明治10年代以後出生的近代日本新生代中學生，其受教過程已是新式教育培養出的明治人第三代，彼等已經不像江戶幕末到明治初年出生的世代，自小就受到「漢文」或「素讀」的薰陶，所以不再具備所謂的漢文「素養」，故必須藉由教育體制的漢文教科來形成其漢文「教養」。

然而，即使一目了然地，以稻垣真久章該書為代表的此類書籍，就是以學習「外國語」的漢文，進而通過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為其目的，但就如日後昭和初年擔任第一高等學校教授的島田鈞一，在其著書《論語全解》中說明道的：

《論語》與我國體一致合和，對我國國民性影響感化巨大，至今日，孔子之道乃我國修身道德之標準。²¹

島田鈞一清楚道出：當時日本中學校的《論語》學習，除了其作為漢文科教材內容，不可避免的語言工具學習目的之外，其更大的目標，就在以之為國民修身道德之準據，以形塑近代日本之「國民道德」。島田鈞一此種觀念其來有自，例如明治末年一戶隆次郎的《論語講義》(東京：大成社，1910年)，就與島田抱持相同觀點。一戶隆次郎此書所採用的講解法，則是由「字義」→「注釋」→「解釋」→「應用」。書前〈序〉文提及所謂：

素讀《論語》不難；但解釋《論語》不易。解釋《論語》不難；惟獲得解釋之法為難。²²

一戶隆次郎還強調不知孔子人格，則不知《論語》之價值，進而論及大日本帝國之政教，提出《論語》「一經」乃教育敕語之注解。一戶隆次郎顯然也是將《論語》作為道德教育教材，進而以之來支撐日本近代的皇國軍國主義體制。

而同時期以「論語講義」為名的代表性漢文學習參考書，還有和田銳夫《新譯論語講義》(神戶：熊谷久榮堂，1912年)、井原正平講述、飯島忠夫監修《新撰漢文叢書 論語新講》(東京：三省堂，1933年)二書。和田銳夫《新譯論語講義》一書之體例，是在附有訓點的《論語》原文後，進而附上漢文訓讀文與讀音的「讀方」，此舉無非昭告了大正時代以還，成長於明治時代後期的中學生們，其漢文原文的解讀力可能又比明治中期時更為衰退，所以僅在原文旁標示訓點的作法似乎還無法協助學生閱讀、理解原文，而必須將漢文訓讀文與讀音完全標出，亦即同時解決「讀音」、「文法」與「義理」的問題，才可進行閱讀與理解。而該書天頭則特別標出《論語》中的「成語」或「格言」式原文，由此舉亦可看出當時中學生的《論語》學習可能已從長篇原文、或者說按篇章次第順序逐次理解的閱讀習

²¹島田鈞一：《論語全解》(東京：有精堂書店，1928年)，〈題言〉，頁1。

²²一戶隆次郎：《論語講義》(東京：大成社，1910年)，〈序〉，頁1。

慣，轉向精華短句、名句的記誦學習方式。若如是，則中學生的《論語》學習，某種程度上似乎也向思想之「標語化」、「口號化」的面向傾斜。

事實上，除了漢文教科、學習、參考用書類的「論語講義」必須在應考功用外負起「思想善導」的責任外，明治 10 年代中期以還陸續問世的，在各級學校、各機關團體講授，乃至私人講論的「論語講義錄」中，強調以《論語》來涵養國民道德精神的主張比比皆是。其中，細川潤次郎、南摩綱紀著、行道學會事務所編的《論語講義》(東京：吉川弘文館，1919 年)。由細川潤次郎、南摩綱紀合講的《論語講義》該書，最能凸顯即使時入近代，日本政府實行明治維新，但上自天皇與上流階級到販夫走卒，都應藉由《論語》來涵養道德的這一讀《論語》，或者說是讀漢籍的手段，進而達成輔翼天皇，建設日本之宏大目標。細川潤次郎言：

論語講義錄者，余之所為行道會員講《論語》之筆記也。明治之初時侍從諸員每月數回相見於侍讀元田永孚宅聽其講經書其意，蓋謂凡官吏奉職諸省者，勤敏執事而足矣。若夫奉仕宮廷者，常在天威咫尺之地，視聽言動必要中禮，其久而不倦者，非有存養工夫不可得而望。而存養工夫莫學問若焉。因此有此事。．．．．．伏惟明治天皇以天縱之聖，建中興之業，在宮廷者奉命兼順，以全忠良臣民之本分，而猶未自安用官暇聽講經，為存養夙夜匪懈，以分聖天子宵旰之勞，則於國家治教之盛，不無所少補焉。

23

而此一宏大目的，自不待言地，當然也與日本戰時的向外「侵略」企圖有著深刻的關聯。

至於井原正平講述、飯島忠夫監修的《新撰漢文叢書 論語新講》一書，引人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其於〈緒言〉中強調：中、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問題多出自《論語》，加上若能熟讀此參考書則可養成漢文「解釋力」，養成漢文「解釋力」也易於突破入學考試難關。井原所謂培養「解釋力」的說法，恰與前述一戶隆次郎《論語講義》中所謂：「素讀」《論語》不難；「解釋」《論語》不易的說法不謀而合。又為了達成中學生自修磨練以通過高等學校或專門學校入學考試的目的，該書只精選輯錄《論語》全書中「妥當適切」的原文材料，此舉又與前述和田銳夫《新譯論語講義》特別將《論語》中的「格言」、「名句」標舉於天頭上這一作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就如井原正平是為了使讀者通過入學考試而精選出「妥當適切」的材料，和田銳夫也是為了使學生「便於記憶」。²⁴而無論是「妥當適切」或是「便於記憶」，其最大目的都是在「考試」。此種追求「適切」解釋以為應考良方的講解《論語》現象，其實早在明治末年就已出現。明治 43 年(1910)，當時東京以出版漢文參考書而富有盛名的誠之堂，就出版發行了所謂《適解正義

²³細川潤次郎、南摩綱紀著、行道學會事務所編《論語講義》(東京：吉川弘文館，1919 年)，〈序〉，頁 1-4。

²⁴和田銳夫《新譯論語講義》(神戶：熊谷久榮堂，1912 年)，〈附言〉，頁 1。

錦囊論語》一書，望文生義，書名便充滿應考色彩。

(三)「論語教本」、「論語讀本」

近代日本《論語》相關論著中，以「教本」、「讀本」為名或其他性質相近之《論語》教科、參考用書，基本上無論是在書本內容、體例或是在編纂目的方面，皆與上述各類《論語》論著有重疊相似性。例如在體例上可能也都採取「頭書」、「鼈頭」此種標注詞語解釋於書本天頭的作法²⁵，以及加入「插圖」輔助經義理解²⁶；或者在《論語》經文原文旁添加訓點，甚至直接標出「讀方」（漢文訓讀全文的讀法與讀音）；繼而附上各章經義講解的「講義」、「譯解」、「通釋」或「解說」；有的則在各章經義講解之前先附有該章經義之「要旨」、「大旨」；最後在經義解說後，有的則會附上朱熹《論語集注》之外的他家說法或江戶先儒各家經注以為「參考」、「異說」。綜言之，書本體例大同小異，然吾人也可從此些微變化，窺知近代日人之漢文、漢籍學習的改變軌跡以及其中意涵。而除了體例的高度相似之外，彼等之著書目的以及漢文學習動機，也與上述他類《論語》論著無異，但隨著時代逐漸下移至大正、昭和，其中「道德涵養」、「忠孝人格之養成」，進而試圖以之進行「精神善導」，或提倡忠君愛國的色彩就越趨濃厚。關於此點，下文且舉數例以證。

古谷義德《少年論語讀本》於昭和 2 年(1927)出版後，昭和 11 年(1936)、17 年(1942)又分別再次出版。該書〈第一章 論語について〉說道：「勉勵學子活用《論語》以培養真道德」，此處所謂「真道德」指的是日本人之主體意識，還包括個人的主體意識。但日本人的主體意識究竟為何？古谷義德如下言及：

日本人身為日本人，要考量時空因素而行動，此中有善、有道德。蓋菅原道真所謂「和魂洋才」，以及山崎闇齋雖尊崇孔孟，但其言：「若萬一孔孟來侵犯我國，則無論其為孔子或是孟子，皆將執劍擊之。」此二者無非是所謂立足於身為日本人這一大自覺上而來活用《論語》的精神。²⁷

古谷義德所以試圖以「論語讀本」來形塑中學生作為日本人的精神意識，乃因其認為中學階段正是學生心思徬徨、易受外界環境思潮影響的時期，所以必須盡快

²⁵例如中等國語漢文研究會編，本田成之加校：《論語新釋》(大阪：湯川弘文社，1940 年)一書構成體例為：「例言」→「目次」→「論語經文」→「添加訓點之經文」→「讀方」→「要旨」→「通釋」。但其天頭處則附有「語釋」，此如同所謂「頭書」或「鼈頭」注解。

²⁶例如古谷義德：《少年論語讀本》(東京：大同館書店，1927 年)一書構成體例為：「序」→「例言」→「插圖」→「目次」→「論語について」→「孔子の人格」→「論語の内容」→「論語經文」→「讀方」→「語句の意味」→「話」→「例話」。該書插圖不像上述他書一般是將插圖至於內文的天頭處，而是在書前便附有曲阜孔廟大成殿、孔子像、孔墓、孔子故宅等圖。

²⁷古谷義德：《少年論語讀本》，〈第一章論語について〉，頁 24。

以《論語》等「良善知識」、「純正思想」之漢籍來對中學生進行「思想善導」²⁸，其中當然存在著濃厚的日本政府試圖統合國民意識的政治目標。其言：

近來各種不善思想，恰如仲夏之積雨雲，風起雲湧，在其欲迷惑清純少年心之際，首先我們至少應該相信此種不善思想，將會融匯進健全思想中，融匯進流淌於《論語》中的大精神中。．．．．．然為何是《論語》？乃因《論語》作為儒教之經典，數千年之間教導了數億人，故雖然世間多少有些異論，但此書乃吾人生命之糧食。²⁹

自由民主主義在大正時代昂揚發展後，大正末年至昭和時期日本軍國主義採取強勢態度，對昭和初期日本受到各種外來思潮影響後，所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社會現象，採取法西斯式的鎮壓，在此風氣之下，《論語》從具備「思想善導」功能的漢籍，演變成具有濃厚帝國軍部打手的色彩。田中貢太郎《漢籍を語る叢書 論語・大學・中庸》(東京：大東出版社，1935年)該書便提及世風日下世局中的「道德修養」問題。其言：

沒有任何時代像現代這般世相混淆。不僅赤化問題或右傾問題雜亂無章，男女貞操問題亦糾紛不已。另一方面，被敬仰為一世之師表的帝國大學教授，卻其言誇誇發表忘卻國體之言論，遭受世人彈劾。又，自身兼國務要職之大臣，到官吏公吏、政治家、教育家之徒，相繼出現收賄問題，引發世人議論，舉世化為罪惡之淵藪，要之，皆肇因於個人怠乎為人之修養。吾為無學之人，今雖不自量力講說《論語》、《學》、《庸》，但本一片耿耿衷心，望現代人們一讀《論語》，其一以資為人之修養，其二以之為國民修養之糧食。³⁰

另外，大木陽堂《生活と教養論語讀本》(東京：教材社，1937年)該書，其將《論語》各章經文直接以「訓讀文」呈現，其後則直接進行解說。書前之〈序言〉提及東洋文化、精神與個人道德、社會正義。大木認為：

《論語》所言者皆為「道」與「德」，此所謂「道」者、「德」者，為人論之根本，人格之細胞，若無此「道」、「德」，則個人之完成無望，社會之進展不可期。故所謂「道」與「德」，乃基督教所謂之「地鹽」，亦近於我國

²⁸以《論語》等漢籍為導正人民思想、涵養國民道德精神的主張，在明治 10 年代初期，由元田永孚所擬之《教育議附議》中便說道：「所謂良善之讀本，西洋修身學中雖有之，但終不能出《孝經》、《論》、《孟》、《學》、《庸》、《詩》、《書》之上。」主張修身教科書應以四書五經為主。詳參教學局編：《教育に關する勅語渙發五十年記念資料展覽圖錄》(東京：內閣印刷局，1941年)，頁 91-93。

²⁹古谷義德：《少年論語讀本》，〈序〉，頁 2-4。

³⁰田中貢太郎：《漢籍を語る叢書 論語・大學・中庸》(東京：大東出版社，1935年)，〈冕言〉，頁 1。田中貢太郎所描述的昭和初年的紛亂世相，基本上是大正以來的世局，蓋大正時代大臣品質的低落，以及吉野造作等教授積極主張民本主義與學問自由，或許都堪稱是「世風日下」的表現，但時入昭和 10 年代，其實不用等到田中來大聲疾呼，例如蓑田胸喜之類的大學教授，就已主動成為軍部打手，迫害打擊美濃部達吉等主張自由主義之教授。詳參紀田順一郎著、廖為智譯：《日本現代化物語》，〈大學教授〉，頁 186-187；〈大臣〉，頁 188-189。

之「**かながらの道**」(神道)。其乃促進個人進步的進軍喇叭，亦是推進社會正義之戰車的前進聲響。³¹

大木將《論語》與西方基督教、日本神道教進行連結的作法，無非將《論語》納入日本固有的傳統之中，同時也將《論語》與外來的宗教作了連繫，使得《論語》可以無分本土、非本土；東方或西方，對任何民族與任何地域、時代的人而言，《論語》具有無地域界限的合適性。

而同樣具有「教本」、「讀本」性質的「全解」、「詳解」或是「義解」類《論語》，基本上也同樣具有上述各類《論語》講解書的諸多特質。例如有關語文教育這點，前文所述島田鈞一《論語全解》，自昭和3年(1928)2月20日出版發行以來，至昭和6(1931)年3月10日共發行18版。該書所以成為如此暢銷的《論語》學習參考書，除了因為該書作為考試參考書，作者十分明白著書性質，島田鈞一說道：

本書因為是為初學所輯集，故主要從古人之說以解釋文章，思想之研究、文字之考證略之，又著者之私說一切省之。³²

亦即，島田深知該書目的不在著者闡述己意或追求經義發明，而在藉由《論語》，培育學子的漢文「教養」。又因朱熹《論語集注》乃當時學校標準的《論語》教材，故島田在書中的字義解釋「皆從朱子之說解之，異說之重要者，收於參考欄，使通其大旨。」³³這是為使學生迅速求得《論語》這一門漢文科教材之「教養」的有效安排，因為先把握住標準解釋，行有餘力在「參閱」其他重要「異說」，既保住基本盤分數，也保留了加分可能。

另外，該書在體例安排方面也非常完備，例如二十篇篇題各有解，各章經文原文旁皆附上訓點，經文原文後再附上「讀方」，亦即「漢文訓讀」讀法，繼而有解釋字詞意義的「字義」部份，接著則是白話日文翻譯經義的「釋義」。最後，若有與朱子說法有異的重要前人注解，或是江戶邦儒之漢文訓讀與島田自己之讀法有異者，也特別說明之，以為「參考」部份。例如〈學而·吾日三省吾身〉章中，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對「三省吾身」的訓讀法為何不符漢文中以「三」字為句首的讀法，皆舉出以為學子「參考」³⁴，頗有在考試目的之外，鼓勵積極學習的用意。而且該書最後除了附有「索引」外，還附上「白文練習」，亦即羅列出《論語》各章原文，以為學生自修、複習、練習、測驗自身「漢文力」用，堪稱考慮周全。不過該書如此暢銷的理由之一，或許還因島田鈞一貴為當時第一高等學校教授，明星高中的漢文科名師出參考書，中學生豈有不趨之若鶩者。

又關於道德教育方面，例如倉田熱血《論語義解》(大阪：文進堂，1932年)，該書前有兩篇〈序言〉，前篇序言除說明《論語》如何有效地活用於現實生活，且

³¹大木陽堂：《生活と教養論語讀本》(東京：教材社，1937年)，〈序〉，頁1。

³²島田鈞一：《論語全解》，〈題言〉，頁1。

³³島田鈞一：《論語全解》，〈題言〉，頁2。

³⁴島田鈞一：《論語全解》，〈學而第一·吾日三省吾身〉章，頁5。

可適用「現時」日本的各個階層，更進而舉出作者自身罹病經驗，證明《論語》的修養功效。由倉田的自身經驗之說明看來，《論語》幾乎等同「醫書」、「聖書」，讀經之效用，或者說道德踐履之效用超乎理性想像。後篇序言中則提出所謂「論語教」一詞，堪稱特殊。書後附有〈附錄 現代紳士の論語觀〉一文，由此文除可窺見近代日人如何尊崇《論語》，其更提出所謂「論語教」來涵養讀者之道德人格，充分反映出《論語》作為「道德教育教材」這一面向之特色，同時也可說明近代日本雖然一意模仿西洋，但《論語》卻是其無法割捨的「傳統」。而關於《論語》乃日本千古以來之傳統一事，大町桂月則有精彩的譬喻，其言：

大體上，儒教多被侷限於所謂老舊思想這一見解之中。然時經千年、萬年，儒教決不為人所廢，是為聖人之教也。而聖人之教非一時之物。日本國民自數千年前以米為日常食品，食米一事雖甚古老，但若廢除之，無人不笑其愚。然世有美食家者，唯求珍物，可謂食物上之亡者也。思想上亦有唯求珍物之亡者，亡者已矣，實無可奈何，然天下豈可全為亡者乎？孔子雖為二千年前之人，然其教皆適切於今日也，請試讀《論語》便可知。不讀《論語》，或讀之誤解而譏之，其愚甚矣。³⁵

大町桂月此種《論語》宛若日本人的米食飲食文化傳統的譬喻，指出了以《論語》為代表的漢籍／漢文化傳統，正是日本人自古以來的精神糧食。大町桂月此一觀點即使在 21 世紀的今天，仍有學者深表贊同而大聲疾呼。³⁶

(四)「新譯」、「新講」、「新釋」《論語》書

如同上述第三類近代日本《論語》相關論著，多指向語文與道德兩大面向，第四類所謂近代日人的《論語》新解書，如前述和田銳夫《新譯論語講義》與大町芳衛《新譯論語》等，皆以「新譯」一詞來標榜其講解《論語》的特色，就在方法、內容上的「新」。此處所謂的「新譯」或是「新注」、「新講」、「新解」，其實都不外指向兩個層面，一是強調在漢文「語文教育」層面，有關漢文之語法、義解，乃至訓讀之讀音、讀法、訓義等的新說法、新解釋；一是強調藉由理解、涵容《論語》這一漢籍義理，進而使讀者達到人格陶冶的「精神涵養」與「道德教育」。

首先關於語文教育層面，誠如前述井原正平講述、飯島忠夫監修《新撰漢文叢書 論語新講》該書，因有鑒於中、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問題多出自《論語》，

³⁵幸田露伴監修、大町桂月譯：《詳解全釋論語》（東京：雙葉書房，1938年），〈論語を讀む者に告ぐ〉，頁21。

³⁶加藤徹：《漢文の素養 誰が日本文化をつくったのか？》（東京：光文社，2006年）一書中也主張：「過去之文明國家，無不擁有所謂全國國民必讀之『數本典籍』。……過去在西方諸國，《舊約聖經》、《新約聖經》即是此『數本典籍』；在幕末之日本，此所謂『數本典籍』，指的即是《論語》和《日本外史》等漢籍。」，〈おわりに〉，頁234-235。

故作者從《論語》選出妥切原文以為教材，僅就朱注進行簡易解說，古來眾多注解僅以附錄形式提供參考，明示應考學習的輕重緩急。著書目的就在使學子熟讀此一參考書，藉此養成漢文「解釋力」，目標在於突破入學考試難關。因此本書的「新講」之「新」，指的無非是培養中學生之漢文「解釋力」的嶄新講解方式，或者說是應考妙方。另外前述和田銳夫《新譯論語講義》特別將《論語》中的「格言」、「名句」標舉於天頭上這一作法，說是為了使學生「便於記憶」³⁷，同樣也可窺知其「應考」訴求。

又如大町桂月《新譯論語》(東京：至誠堂，1912年)，大町於該書前〈論語を讀む者に告ぐ〉(告《論語》讀者)一文中指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施」字不應如歷來一般讀為「ほどこす」(施加、施行)；而應該讀為「うつす」(轉移)，大町並進一步將之與戰爭時，士官不將懼怕死亡這一心理恐懼「轉移」給士兵，仍以身先士卒為要。接著又說明孔子所以會說出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乃因中國歷來不乏邪惡政治家的緣故。³⁸本書自明治45年6月15日初版至大正9年8月30日，已印達23版，足見其受歡迎以及普及之程度。而與他書相異的是：該書反而將《論語》原文列於天頭，卻將訓讀文列於其下正文處，之後則是大町桂月對各章經文的譯解。由此可見，時入大正之際，訓讀文顯然已經超越漢文原文而取得其在漢文學習過程中的主要正統地位，漢文原文反而淪為配角。而該書在附有訓點的《論語》各章經文後隨即附上「讀方」看來，這顯然是顧慮到中學生未必能誦讀僅加標「訓點」的漢文。另外，書後附有按照50音順的〈新譯論語索引〉，大町於該篇索引之〈例言〉中主張：索引便於只記得佳句名言的《論語》讀者查閱出處及全文，也可就人名與專有名詞、概念來獲得綜合性知識。足見其試圖以「索引」、「目錄」等類似工具書性質的手段，而來輔助漢籍、漢文學習的語文教學方法。

其他如中等國語漢文研究會編、本田成之校《論語新釋》(大阪：湯川弘文社，1940年)，該書體例先是《論語》經文原文，而原文標有「訓點」，但後又有「讀方」，由此再次證明進入昭和10年代中期，對中學生而言，彼等未必能誦讀僅標有訓點的漢文，而由前述明治45年出版的和田銳夫《新譯論語講義》書中，在附有訓點的《論語》各章經文後隨即再附上「讀方」看來，此種中學生無法直接藉由訓點以讀出漢文訓讀的情形，或許是大正以來的常態。

如上所述，此類漢文學習參考書的「語文教育」，或說「應考」功能非常明顯，但「道德涵養」、「精神鍛鍊」仍是此類應考參考書的重要主張，此點即使是在近代日本專業漢語學界亦不例外。³⁹

³⁷和田銳夫：《新譯論語講義》，〈附言〉，頁1。

³⁸詳參大町桂月《新譯論語》(東京：至誠堂，1912年)，〈論語を讀む者に告ぐ 六〉，頁25-27。

³⁹日本近代漢語名師宮島大八創立漢語、漢學學校「善鄰書院」，其於明治31年(1898)9月落款的〈善鄰書院主意書〉中主張：日本亦亞洲之一員，道德之根底實存於儒教。而道德的涵養不能離孔

四、結論—古／今·雅／俗·語文／道德相融的漢文教育

據本文之考察，我們藉由對近代日本《論語》教科、參考用書的分析研究，可以觀察出以下幾個日本近代漢學與漢文教育發展的特點。

(一)非學院派漢文教科、參考用書作者群的出現

倉田熱血《論語義解》批評當時學者乃「在某種意義上只是一位藝人」⁴⁰的說法，指出了近代有一群非學院派漢學者／學者的人士參與近代《論語》類漢文教科、學習參考書的編纂，而倉田正是其中一員。此事無非再次證明所謂：「明治初年，一般人們都具有漢學素養」⁴¹的這一事實。也因為近代日本各類型的《論語》教科、參考用書的編纂，有著各種領域、出身背景的人士參與，故能掙脫學術藩籬與家派侷限，而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盛況。雖然大部分書籍未必具有學術性，但卻也可將之視為是：江戶時代由於漢學教育普及，武士和百姓(農民)、町人(工匠、商人)等中產階級皆可學習漢文，漢學普及後的一種漢學素養的開花結果。若從這一角度來看，則明治時代的《論語》相關教科、參考書類論著，堪稱是江戶漢學的餘韻。而此點由朱子《論語集注》仍是近代日人學習漢文的必經門經，且多舉出江戶先儒代表性的《論語》注解與之參照看來，江戶漢學的研究成果，與朱注同時成為近代日人讀《論語》的對照參考值。

(二)漢文／漢籍學習的主流方法

自江戶中期以還，即使荻生徂徠不斷抨擊「漢文訓讀」是種錯誤的漢文學習方式，易使人產生「卑劣心」，而大正時期青木正兒也重提徂徠的此一呼聲，但若從本文的考察來看，即使時入近代，新式教育中的漢文科學習，「漢文訓讀」法堪稱是始終不變的主流學習法。而如果從江戶時代公家機關或個人之間，彼此往來之公文與書信皆以「候文」(夾雜假名與漢字的變體漢文)書寫；然明治時代無論官員、軍人、學生、記者卻皆以漢文訓讀式的文體日文來書寫文章，甚至由明治天皇所頒布的《教育勅語》亦以訓讀文書寫看來，我們可以說漢文訓讀在近代日本社會中，完全取得其在公／私·雅／俗各層面的主流表述語言地位。而此點在近代日本各類型的《論語》教科、參考用書中亦不例外。

(三)漢文力的轉變

子之教而求其他。亦即漢語學習的終極目標，仍在「人格陶冶」。詳參村山吉廣：《漢學者はいかに生きたか—近代日本と漢學》，頁 187-190。

⁴⁰倉田熱血：《論語義解》，〈序文第二本著ある所以を告ぐ〉，頁 9。

⁴¹三浦叶：《明治の漢學》(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頁 15。

近世到近代的轉變，就是日人的「漢文力」從「素養」轉為「教養」，從「自然而然的薰陶」轉為「有意識的學習」。而如果從近代《論語》教科、參考用書的體例內容發展來看，明治時代由於教育體制的變革，所以漢文學習逐漸喪失其自然學習環境，轉變成在教學體制內意識到入學考試，為應考而被迫學習。因此並非藉由「漢文」學習來獲得一個整體的知性世界；而多是在集聚片段知識，因此會出現所謂選取重要、適切原文教材，或是背誦佳句、名言的方式來學習《論語》，然知識的獲得未必保證能轉化為教養。因此，大正時代顯然是日人漢文力從「素養」轉為「教養」的關鍵轉換時期，江戶以來日本蓄積二百七十年左右漢學素養，到幕末堪稱是日本的漢文力巔峰黃金時期，而此一臻至巔峰的漢文知識力，卻因一夕的政權轉換而被迫淪為過時、無用之術；但此種漢文素養的力道，卻延續到明治時代，但卻也由此一路下滑，進入大正時代後則急轉直下快速衰退。⁴²

(四) 雅／俗合一的語文教育功能

中學時代讀《論語》等漢籍的近代日本中學生，其日後不再侷限於「漢文」、「漢學」領域，彼等或從事日語語文教育，或從事漢語語文教育，前者如大野晉(1919-)，後者如安藤彥太郎(1917-)，彼等都是 1910 年代後期出生的人，都深受其中學時代漢文科教育的影響。但其學術路徑的發展卻是從漢學到日語；以及從漢學／漢文到漢語，但無論其日後發展為何，其間卻都是透過「漢文訓讀」，而獲得「目讀」方面的文義理解能力；但並非同時擁有現當代中國時文「音讀」方面的發音能力。⁴³但若從近代漢文教育的結果論而言，其使得江戶時代代表「高雅」學問世界的「訓讀」，與代表「卑俗」實用世界的「唐話」／「漢語」，逐漸融合成一體。

(五) 「經義」獨大的道德教育功能

江戶人學習漢文，是試圖獲得一種人格學問力，但近代日本自從西村茂樹、元田永孚於明治 10 年代提倡以孔子之教資之的道德教育，到明治天皇頒布《教學大旨》，就已確立所謂：

⁴²日語學專家大野晉(1919-)曾提及其自身的漢文素養，與其高等學校年長自己 11 歲的老師五味智英相比；五味智英老師再與其長自己 12 歲的老師麻生磯次相比；麻生磯次老師再與其長自己 10 歲的老師安倍能成相比，約每隔 10 年一代，漢文素養就每下愈況地不斷衰退。所以安倍老師能作漢詩；麻生老師卻不擅長作漢詩，但能流利朗誦江戶時代的題畫詩文；五味老師無法流利朗誦詩文，卻像本活字典一樣，大野須要查閱《漢和辭典》的字彙、詞條，五味老師卻可隨口說出。大野的此番感嘆恰好說明了明治到大正，日人漢學素養的急劇衰退情形。詳參大野晉：《日本語の練習帳》(東京：岩波書店，1999 年)，頁 41-42。

⁴³有關此點詳參倉石武次郎：《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實際》(東京：岩波書店，1941 年)。

教學之要，在明仁義忠孝，究智識才藝，以盡人道。此我祖訓國典之大旨、上下一般之教也。．．．．．故自今以往，本祖宗之訓典，專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⁴⁴

故近代的漢文學習遂將此種人格道德連結到「精神」層次，強調此乃日本固有之傳統精神。然而若從江戶漢學的發展實況而論，以《論語》為代表的典籍「經義」的讀取，在語文教育功能之外，其主要功能則是出處時經世濟民的政治指針。但退隱時的人格涵養、精神生命貞定力，乃至表述政治抱負，則詩文亦有其相當之功效。但兩者若要作一區隔，則「經義」傾向於「機能性」；「詩文」傾向於「精神性」，此由所謂：「蓋徂徠歿後，物門之學分為二。經義推春台，詩文推南郭。」⁴⁵這一二分法亦可窺知一斑。而相對於春台曾言：「聖人之道者，自治天下國家外別無所用，．．．．．捨是而不學，徒事詩文著述而過一生者，非真學者，無異於琴棋書畫等曲藝之輩。」(太宰春台：《經濟錄》卷 1)服部南郭則說：「予決不云經濟之事」。⁴⁶足見江戶中期以還，習讀漢籍、取其「經義」以經世，漢籍學習其實是極具社會現實功能的機能性。而原本屬於個人精神世界之風雅、趣味層面的「詩文」，同時也可通行於「公領域」。然若就近代日本《論語》相關論著之特質而言，則明治漢學的發展，基本上可以說是割捨掉「詩文」這一關乎個人私密生命精神情感的「無用術」，而卻試圖以「經義」中諸如忠孝等攸關國族發展存亡的德目，來取代「詩文」背後所代表的個人私密精神情感。透過提昇個人對國家的「公共」意識，否定、批判個人耽溺於私人情意世界，以統合整體國民意識，達成對國家、天皇盡其忠孝之本分，護翼日本之「國體」。⁴⁷

(六)近代日本中國認識與漢文教育的雙重結構

近代日本藉由模仿西洋的「文明開化」政策，試圖藉由拋棄漢文、漢籍所代表的漢文化，結果卻走向專業的「漢語」學習，或是在蔑視「現實」中國的同時，卻又試圖藉由崇敬中國典籍所代表的「古典」中國價值，並以之為日本傳統價值、精神，進而建構現代「新」日本。本文透過對近代日本《論語》教科、參考用書，

⁴⁴教學局編：《教育に關する勅語渙發五十年記念資料展覽圖錄》，頁 4-7 圖版四。

⁴⁵江村北海：《日本詩史》(收入清水茂等校：《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 65 日本詩史 五山堂詩話》，東京：岩波書店，1995 年)，卷四，頁 509。

⁴⁶湯淺常山：《文會雜記》(收入《日本隨筆大成》第 7 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27 年)，卷 1 上，頁 575。

⁴⁷日本學者安藤彥太郎就說：其當初所以會選擇修讀中國語，又中國研究者新島淳良所以對中國大陸有所憧憬，其實都是深受山中峰太郎《敵中橫斷三百里》、《亞細亞之曙》等少年愛國小說之影響。詳見安藤彥太郎：《中國語と近代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8 年)，頁 79。足見戰前漢文教育受忠孝仁義精神善導以及護翼國體思想影響之深。

以及漢文學習、參考用書的考察分析，我們看到近代日本一面與中國交戰的同時，卻又不斷積極學習四書或《論語》等漢籍，其蔑視「現實」中國甚至侵略中國的同時，其卻又崇敬「古典」中國，試圖找出挽救、圖強日本國族的元素，而《論語》正是此「古典」中國的主要代表。但也因此一「古典」可能是非「現實」的、非「具體」的，是紙本「符號」的存在，故可以允許近代日本人在其國族、文化發展脈絡中，建構諸多非《論語》「文本」原義的可能意義，亦即包括作為戰爭時期鼓吹、約束人民的「思想善導」教材，說服人民或者使人民相信，以其為「日本固有精神」之根源、傳統，藉此來涵養日本國民之道德精神。換言之，在近代日本的當代「支那」理解與古典「中國」理解之間；以及傳統「漢文」學習與現代「漢語」學習之間；乃至傳統「江戶漢學」研究與近代「支那學」、「中國學」研究之間，其開展過程恰好表現出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認識乃是一種雙重結構的存在。而近代日本《論語》教科、參考用書所展現的漢文、漢籍教育發展史，正是日本由近世發展到近代的古／今·雅／俗·語文／道德等雙重結構並存相融的經典教育。

徵引文獻

近人論著：

1. 一戶隆次郎：《論語講義》，東京：大成社，1910。
2. 三浦叶：《明治の漢學》，東京：汲古書院，1998。
3. 上羽勝衛：《勸孝邇言》，東京：惺惺軒，1873。
4. 土屋弘：《人之基：修身》，大阪：鹿田靜七，1874。
5. 大木陽堂：《生活と教養論語讀本》，東京：教材社，1937。
6. 大町桂月：《新譯論語》，東京：至誠堂，1912。
7. 大野晉：《日本語の練習帳》，東京：岩波書店，1999。
8. 大賀富二編，《頭書插畫四書字類大全》，東京：同盟書房，1881。
9. 山本笑月：《明治世相百話》，東京：有峰書店，1971。
10. 中村惕齋：《四書示蒙句解》，《漢籍國字解全書：先哲遺著》第1卷，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9年。
11. 中等國語漢文研究會編、本田成之加校：《論語新釋》，大阪：湯川弘文社，1940。
12. 井原正平講述、飯島忠夫監修：《新撰漢文叢書 論語新講》，東京：三省堂，1933。
13. 內村友輔點：《論語正文：音訓附》，松江：石原光璋，1882。
14. 內村友輔點：《鼈頭論》，松江：大蘆利七等，1882。
15. 毛利貞齋：《四書俚諺鈔》，大阪：秋田屋太右衛門等，1869。
16. 加藤徹：《漢文の素養 誰が日本文化をつくったのか？》，東京：光文社，2006。
17. 古谷義徳：《少年論語讀本》，東京：大同館書店，1927。
18. 田中宗確點：《論語集注》，東京：丸家善七，1883。
19. 田中貢太郎《漢籍を語る叢書 論語・大學・中庸》，東京：大東出版社，1935。
20. 石井光致：《修身談》，東京：千鍾房，出版年不詳。
21. 石村貞一：《修身要訣》，大阪：松田正助等，1874。
22. 宇野哲人：《論語新釋》，東京：弘道館，1927。
23. 安藤彦太郎：《中國語と近代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8。
24. 江村北海：《日本詩史》，《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 65 日本詩史 五山堂詩話》，東京：岩波書店，1955。
25. 西坂成一：《訓蒙軌範》，東京：山本良齋，1873。
26. 村山吉廣：《漢學者はいかに生きたか q-近代日本と漢學》，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
27. 町田三郎：《江戸の漢學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
28. 和田銳夫：《新譯論語講義》，神戸：熊谷久榮堂，1912。
29. 岡泰彦編：《新選論語 高學年用》，東京：標準教科書出版協會，1933。
30. 幸田露伴監修、大町桂月譯：《詳解全釋論語》，東京：雙葉書房，1938。

31. 芝田好章點、太山東嶽校訂：《四書集注》，京都：永田調兵衛，1873。
32. 金培懿：〈近代日本《論語》研究之轉折—安井小太郎《論語講義》析論〉，2006，《國文學報》40：19-73。
33. 金培懿：〈旁白敘事·聲音傳達·意象建構—澀澤榮一《論語講義》研究〉，2006，《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8：31-80。
34. 金培懿 2007 〈轉型期《論語》研究之主旋律—近代日本《論語講義》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編，《臺灣學術新視野—經學之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頁 335-392。
35. 後藤松陰點：《論語集注》，浪花：清玉堂，1881。
36. 後藤嘉平點：《改正訓點四書集注》，大阪：青木嵩山堂，1883。
37. 紀田順一郎著、廖為智譯：《日本現代化物語》，臺北：一方出版，2002。
38. 倉田熱血：《論語義解》，大阪：文進堂，1932。
39. 倉石武次郎：《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實際》，東京：岩波書店，1941。
40. 島田鈞一，《論語全解》，東京：有精堂書店，1928。
41. 海後宗臣、仲新：《近代日本教科書總說—解說編》，東京：講談社，1969。
42. 教學局編：《教育に關する勅語渙發五十年記念資料展覽圖錄》，東京：內閣印刷局，1941。
43. 細川潤次郎、南摩綱紀著、行道學會事務所編：《論語講義》，東京：吉川弘文館，1919。
44. 湯淺常山：《文會雜記》，《日本隨筆大成》第7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27。
45. 溪百年述、深井鑑一郎校：《論語國字解》，東京：寶文館刊行，1910。
46. 溪百年編注：《大學余師》，東京：日吉丸書房，1909。
47. 溪百年編注：《中庸余師》，東京：日吉丸書房，1909。
48. 溪百年編注：《經典余師 四書之部》，大阪：同盟社，刊行年不詳。
49. 溪百年編注：《論語經典余師》，東京：日吉丸書房，1909。
50. 蒲池彌太郎點：《四書集注》，盛岡：藝香閣，1881。
51. 稻垣真久章：《少年叢書漢文學講義 論語講義》，東京：興文社，1891。
52. 橫尾謙點：《四書集注》，大阪：田中太右衛門，1876。
53. 關儀一郎編輯、服部宇之吉等人校訂：《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2-1926。
54. 關儀一郎編輯、服部宇之吉等人校訂：《續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27-1930。
55. 瀧澤清點：《四書集注》，東京：安藤橘綠，1879。
56. 榊原英吉編輯：《鼈頭註釋四書自學自在》，東京：求光閣，1892。